

序 诗

——丁玲塑像前

冰之是飞蛾扑火

非死不止

——瞿秋白

在该找到你的地方没有找到你，

在见不到你的时候又看到了你。

一个车站又一个车站，

一个码头又一个码头。

一个少女，一个“扑火的蛾”，在火的光焰中旋舞，

一个辉煌又惨烈的人生预言，难行，也离乡上路。

没有结束的预言，你跋涉的归宿，是在下面落户，
风雪叩着你的家门，寂寞了柱边的火炉。

在找不到你的时候见你，真是神话，
一场浩劫，生死未卜，一个早晨你复活在我们当中。

在该见到你的地方看不到你，病房的门，关闭的港，
你还要审稿，躺在病床吃力地听人朗读。

确实无法见到你了，你离去几个春秋，
可火不灭，就有凤凰自火中飞出。

望着你在石座上，读到你的预言血热，
你围在大家当中，眼亮了，嘴角笑了，生命又复苏。

在我们找不到你的时候找到你，
在我们见不到你的地方看到你。

目 录

序 诗.....	1
----------	---

辩 诬 书

第一章 人 祸.....	3
第二章 丁玲是莎菲? !	85
第三章 丁玲是叛徒? !	217
第四章 《三八节有感》再批判	347
第五章 “一本书主义”	451
代尾声 丁玲死了	566

安 魂 曲

一、二十九年后	569
二、门与潮	582
三、对 比	598
四、“体验生活”	611

五、鸡与凤凰	622
六、凤凰与鸡	643
七、“牛棚”外的不自由与大墙内的自由	667
八、东风吹开的大门	699
九、牢骚太盛防肠断	716
十、良 药	728
十一、无法漏抄的一则发言记录	733
十二、走不出的世界	756
十三、“走向世界”的走向	764
十四、大家的生日	789
十五、最后的微笑	811
十六、不会结束的悼念	828
十七、能复活的死者	835
后 记	845

辩 诬 书

· 第一章 ·

人 祸

(5) 一、地冻三尺

(19) 二、给李之璉的信

(32) 三、所谓的“反党活动”

(44) 四、《辩正书》

(69) 五、如此“大辩论”

六、丁玲死了(正文见566页)

一、地冻三尺

这，多事的人世，这人世，又怎不多事；风风雨雨，都是人生！

它，有真，就有假；有善，便有恶；有龌龊，就有纯真；有创造，就有破坏；有野蛮，就有文明；有高尚，就有卑鄙；有怯弱，就有勇敢；有阴谋诡计，就有光明磊落；有邪恶的疯狂，就有凛然的正气；有坦诚无私者，就有伪善诡诈者；有大度的君子，就有势利小人；有人性，就有兽性；有大写的人，就有似人的狼……。几多故事，几多悲欢！

人活着，在这人生的正剧里，不论是大小，自觉或不自觉，总得在其中扮演一个角色。许多人，还是默默地度过他有意义却又是平凡的一生；奇人奇事要多，也就不为奇了；圣君、贤人也是太少才奉为圣贤。可是，一个人入戏到时代、史诗的命题里，那么，不是轰轰烈烈，也不会冷冷清清，不论大小，

不论正负，他都是个角色，是个人物。然而，一个人要是为了使她的一生有价值，而要他在铁与砧之间，以血肉之躯锤炼于血淋淋之中才显英雄本色，那么，天公就太不公了！它可以是有戏的戏，虽壮，但也太悲！

过来人，都难说自己是观众，还是演员。有人，强者，可以选择自己的角色；更多的人，只能在戏的开展中卷了进去。

那是共和国在敌人磨齿与反攻的炮声中成立不久的年月，磨齿声与炮声还在。在谨防敌对的力量、敌对的思想时，高度警惕而夸大敌情时的心态，混淆矛盾，再加上简单对待，本来就很复杂的问题，就会把问题弄得更复杂了。在“文艺界和社会上引起很大震动，给受害者带来很大不幸”，“株连面广，延续时间长”^①的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也就在那时立案了。

丁玲那时因为脊椎增生病变，出外疗养，1952年10月，就已辞去中宣部文艺处长及文协的工作。而且，春天她就离开了《文艺报》，接任艾青帮助茅盾编《人民文学》。实际上，由于兼职太多，社会活动太多，她在这两个刊物，都没有、也不可能管太多的事。然而，就在她离开《文艺报》的时候，《文艺报》为配合文艺界进行的整风，在《通讯员内部通报》上，发表了一些读者来信，提出应该对胡风文艺思想开展批判。这是开国后，将长期以来同胡风文艺思想的论争，这么公开点名而使之趋于尖锐斗争的信号。在还没有给胡风戴“反革命”帽子前，除了对他文艺思想的批判，还说他“进行过抵制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损害革命文艺界团结的宗派活动”。这对过来人说，是没有说

① 林默涵：《胡风事件的前前后后》，《新文学史料》1989年3期。

服力的。

早在30年代，丁玲跨进文坛的时候，也是胡风在鲁迅身边的年月，她还不熟悉胡风，鲁迅，她却很敬仰。那时，一些“唯我独革”的人，孤立、打击鲁迅的错误做法，她太熟悉了。以后，由于抗战，民族的，阶级的，内部的矛盾使个人之间的恩恩怨怨也更加复杂，盘根错节，难解难分。这个说那个是宗派，那个说这个是宗派，到底谁是宗派，也不是谁有权就说了算。这点，丁玲心里是有底的。她同胡风早在“左联”时就共过事，却谈不上深知。那时她不关心理论，同胡风就隔行了。胡风倔犟的脾气，是有名的，他那本来就大、因为秃顶而显得更大的脑袋，加上一副浓眉，发怒时仿佛就像一颗会爆炸的炮弹。对于喜欢别人奉承的人，这自然是个不讨人喜欢的人；对于丁玲，是沈从文说的，在她面前会忘记她是女人的丁玲，是绝不回避交这样的朋友的。作为作家，她对胡风这种“源源地发现从实际战斗里长成的新的同道伙友”^①的热忱，对胡风那种丈夫气概，中国式的侠义心肠，是完全理解的。抗战时，她在延安陕甘宁边区，母亲还在湖南老家，失业，生活无着，还给她带着两个孩子，国统区和边区又不能直接通邮，双方的信都是托在国民党的陪都重庆的胡风代转，偶尔有点稿费，也由胡风直寄丁玲母亲，帮助老人度过困难。胡风在大后方，靠那贤慧又颇为熟悉文坛人事的夫人梅志的帮助，办了《七月》，又办《希望》，丁玲给它写稿，也转去一些其他同志的作品，不仅是为稿子找到发表的地方，更希望在沉闷、压抑的大后方文坛，看到边区和前线文艺的生机。1936年西安事变后，丁玲在前线收到军委主席毛泽东用军队电报拍发的赠词《临江仙》，倍受鼓

① 胡风：1937年10月16日《七月》创刊辞

舞，因为怕在战乱中保存不便，后来就将赠词的真迹寄给胡风，希望在胜利重逢的日子再去取……。

这些就是他们之间的接触，当然，这需要不一般的信任。在一个时代大的动荡和突变中，任何人也无法掩饰他为人基本态度。“人以群分，物以类聚”，概莫能外。“群分”，也得看什么“群”，怎么“分”，不然，谁不可说谁是“宗派”？

说到这些事，丁玲晚年对周围的人不止一次的说过：“一整胡风，我就预感到有人是不会放过我的！”

不是么？当年在抗日的炮火中，千里迢迢奔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后到延安的壮族作家陆地，有个短篇《落伍者》登在丁玲、艾青和罗烽等几位轮流主编的文协会刊《谷雨》第四期（1942.4）上，与名家之作并列。署名陆地的新人，引起文学圈的注目。本来，这对陆地是喜事，不想麻烦事也接踵而来。有人对陆地说：“你本是鲁艺培养出来的人，有作品为何不给《草叶》？”《草叶》是何其芳主编的鲁艺校刊，陆地在《谷雨》发个短篇，就成了另投山门的异己份子了。紧接着在5月召开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当头一棒，就说陆地写了一个“落伍者”，“不就是对革命队伍的诬蔑吗？”^①好在陆地已调到军委系统工作，要是还在那儿，他还能活出头吗？

不是么？诗人贺敬之，在抗战最艰难的年月，延河边上就有他的歌声。鲁艺集体创作的《白毛女》，他可是参加的主要执笔人，这可是人家拿来争面子的戏。1952年6月7日，苏联大使馆代表斯大林奖金委员会授奖，以及第二天文艺界为此举行的

① 陆地：《七十回首话当年》，《新文学史料》1989年4期。

庆祝会，年近五十的丁玲，看着这位才气和热情同样洋溢的诗人，她是真羡慕他才二十八岁。他十几岁以“艾漠”的笔名在胡风主编的《七月》发表诗的时候，他知道那是国统区的一块进步的文学园地。《七月诗丛》胡风选的《我是初来者》选了他的诗，就因为他也是“初来者”，并没有什么别的关系。后来《诗丛》出版他个人的专集《并没有冬天》，也是大家同样相信“既然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为此，那时年轻得令人羡慕的诗人，写信感谢胡风对他的关心、支持，不仅从情理上无可非议，从原则上讲，也没有什么出格的地方。不想，在这多事的5月，贺敬之访问民主德国回来，一下飞机，一辆汽车就把他接走接受“谈话”了，接谈的人劈头就问：“你是周扬同志培养的，你怎么说自己是胡风培养的？”这一闷棍，比当年的陆地挨得更加晕头转向，莫名其妙：“我是党培养的，不是哪个（人）培养的，我更没有说过自己是胡风培养的……。”

有些搞人身依附、封建家族者，横眉怒目所斥的“宗派”是什么，不是不可以打问号的。后来有些事的做法，越来越不正常了，报上公开披露的，有的已经不是与胡风本人有什么接触，只是读了他的书，或与一些过去围绕《七月》的主要撰稿人有往来的，也都要“消毒”，好像过去传说把麻疯病人赶在一起，架起火来烧一样。因此，当时丁玲预感到会有人趁机扩大包围圈，把火烧到她头上的心理准备，并非是多余的。

然而，丁玲5月13日在无锡继续她的疗养，也在继续写她的长篇《在严寒的日子里》时，看到当天的《人民日报》，赫然入目的《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叫她那枝在稿纸上飞动的笔，沉重得让她再也提它不动了，钢笔尖戳在纸上滩化开一团墨污。她不仅写不下去了，要想个什么也想不下去了。又是

焦躁不安，又是心冷如冰。她虽然不搞理论，创作却不是同理论绝缘的。她从多年参加文艺领导工作和对文艺思想的定向思维，她也不会完全同意胡风的那么多意见。然而，再多的异议，也是文艺思想，谁会想到那《材料》上揭露的，竟是胡风的那么多见不得人的事呢？她接到通知，指定她去上海看材料。一则摘自张中晓给胡风的信的材料写道：“我过去写过一些杂文和诗，现在待身体再较好一点，我准备再写。二年来，我脾气变了许多，几乎恨一切人……对这个社会秩序，我憎恨。”既然如此，《按语》说“还是这个张中晓，他的反革命感觉是很灵的，较之我们革命队伍里的好些人，包括一部分共产党员在内，阶级觉悟的高低，政治嗅觉的灵钝，是大相悬殊的。……”“他们对解放后的新社会、对人民革命政权，表现了刻骨的仇恨，他们说，‘对这个社会秩序，我憎恨’……”这样的话，也是言之成理的。谁也不会知道，张中晓这封信在未经“摘录”之前是这样的：

1948年5月，我突然吐血（据医生诊断是已有五、六年历史底肺结核），很厉害，血吐了二大面盆，原因大概是过去几年底困苦和二年来底‘用功’，于是，回家。现在，又二年了。

我过去曾写过一些杂文，和诗，现在，待身体再较好一点，我准备再写。

二年来，我脾气变了许多，几乎恨一切人。二年来，我睡在床上，家中情形也不甚好，我是用最大的力量战胜肺结核的，我想，这是使我恨一切的原因。二年来，我所受的苦难比从前的些日子多，我懂得了什么叫做贫穷！什么叫做病，什么叫做挣扎！……对这个社会秩序，我憎

恨（这里的省略是原信所有的，分段也依原样）！^①

张中晓原信中所说的“我憎恨”之所向，应是平日在群众中进行“忆苦思甜”和阶级教育的正面教材，不想经人这么一“摘录”，却成了阶级敌人“对人民革命政权，表现了刻骨的仇恨”的反面材料了。是在什么具体环节上弄成了那个样子，至今也闹不清楚。这样呈报上去，批示下来，刊登在党的机关报上，那么，对大家就不仅是相信的问题，而是听到了敌人的磨齿声，激起的是无法平息的阶级仇恨。5月23日，《人民日报》二版头条是丁玲写的《敌人在哪里》——

读了13日的《人民日报》上舒芜所揭发的材料、胡风给他的一部分信件，我是怎样也无法继续我的日常工作了。真是令人毛骨悚然，敌人在哪里？敌人就在自己眼前，就在自己的队伍中，就在左右，就在身边。明枪容易躲，暗箭最难防！胡风原来是一个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装饰着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混在我们里面，口称“朋友”，实际上包藏着那么阴暗的，那么仇视我们的，鄙视我们的，恨不能把我们一脚踩死的恶毒的心情，进行着组织活动的阴谋野心家。……

这篇写得浮泛的短文，可以看到她写它时的烦杂无绪的心情。生活真会捉弄人，一位相识二十年的朋友，经“舒芜所揭发的材料”揭其“画皮”，她是既恼恨自己不辨真伪良莠，又惊呆于它的“真象”，一旦明白它恰恰是有更深内容的假象时，她

^① 梅志：《历史的真实》，《新文学史料》1990年1期。

也不可能收回这篇表态文章了。晚年,她列有一个生前要完成的写作计划,其中,就有为这篇短文再写一篇长文的心愿,无奈生命不给她时间了,只好带着遗憾到另一个世界与胡风长谈了。

然而,真的还是真的。根据多年的生活经验自然而然的预感,成了事实,中国作协召开了党组扩大会,批判所谓的“丁(玲)、陈(企霞)反党活动”。

在新时期,一位海外人士听到“丁、陈反党集团”这个词,就问“陈——是不是陈明?”告诉他,“陈”是“陈企霞”时,他就茫然,感到不可理解了。

根据印发的批判发言记录看,“丁、陈是1941年在延安《解放日报》开始一起工作的。他们第一次合作中最大的成就,就是发表了《野百合花》和《三八节有感》。”“陈企霞到《文艺报》,是被党派到《文艺报》去工作的,但是当他掌握了《文艺报》,后来就发展到党绝对不能碰《文艺报》的程度。当党决定丁玲任《文艺报》主编,陈企霞、萧殷任副主编时,陈大发脾气说,‘主编就主编,什么副主编!’后来丁玲就不惜牺牲党的组织决定来迁就他,《文艺报》印出来果然就是三个主编!”^①事实上,此事丁玲“曾口头请示过周扬。周表同意后,刊物上才并列出丁玲、陈企霞两个主编。这顶多只能说是任命主编手续不完备,不能说是向党闹独立。”^②退一步说,丁玲即便没有请示周扬,就是没有坚持原则,那么“迁就”了陈企霞怕也不是“反党”,或小“集团”的关系。何况,她与陈企霞共事,都是上级委派的,并非用关系拉来的,或是个人组阁来的。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不过,整人还是要找个由头。由于追查一封匿名信,信的

① 中国作家协会:《对丁、陈反党集团的批判》14—15页(1957年9月)

② 李之琰:《不该发生的故事》,《新文学史料》1989年3期。

内容说作协批评《文艺报》是独立王国，给陈企霞留党察看的处分等问题，全都错了；说陈企霞是大好人，是作协有人阴谋陷害他。根据这种内容，就推想一定是陈企霞写的。虽然丁玲1952年春就离开了《文艺报》，而且在这之前，北京文艺界整风，她还作了《为提高我们刊物的思想性战斗性而奋斗》的讲话。她说：“我们还有很多人用一种传统的观点、旧的观点去对待我们今天的刊物，把刊物常常看成只是一伙人的事。过去一小伙人掌握了一个刊物（即是所谓同仁刊物），发表这一伙人的思想，宣传这一伙人的思想，反对一些他们要反对的，也慷慨激昂过，也发牢骚。这些刊物有的曾经因为被进步人士所掌握，当时起过一些积极的作用，有的编辑部里因为有共产党员，曾反映过一些党的政策。但这种办刊物的办法，已经过时了，我们应该明白我们已经处于另外一个崭新的时代了。我们已经是主人，国家和人民需要我们的刊物能担当思想领导的任务，能带领群众参加一切生活中的思想斗争，并且能引导和组织作家们一同完成这个任务……”。^①不想，人家恰恰就用她反对的来反对她。陈企霞在《文艺报》出事时，她已离开《文艺报》几年了，人家还是早已定向瞄准了她，硬派给她当“黑后台”的角色了。

可惜的是，当时还没有目前这样的录音录像的科学设备，可以留在今天做硬邦邦的历史证明。当年的当事人，几十年过去，有的年事已高，记忆模糊了；有的记忆犹新，也只有私下聊聊；要是碰到一位不能为贤者讳，别人不高兴也无所谓，要是把真事反而闹成为“假”事，要你不能当真事写，就太煞风景了。难怪过去有人写丁玲，总回避这段历史，跳过去写。但是，那二十多年，不仅是她命运坎坷，道路曲折的年月，也是作家

① 1951年12月10日《人民日报》